

## ·甲骨与石刻·

## 1960年以来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上)

——钱存训著《书于竹帛》英文本第二版后序\*

[美]夏含夷 著 王正义 译

钱存训教授的这部《书于竹帛》今日已成为经典著作。当他从事此书写作时,虽然他自己并未想到,但其时机的重要恰与此书的内容相同。他开始写作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长期的抗日战争和其后的内战方告结束,在继起的那一段相当和平的年代,才能出版考古学者在战前所发掘的许多重要成果<sup>①</sup>。以此,钱氏方能将这些资料综合归纳成为他的一家之言,用以述说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和古代书籍的制作。他的这部书原刊于1962年,但却成为此后十年间在此领域内最后的出版品之一<sup>②</sup>。首先,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纸张极其缺乏,学术性的出版物都陷于停顿;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使所有学术工作都几乎停顿了六年之久。所以钱氏的这部《书于竹帛》堪称为中国古文字学初期研究的总结。

文化大革命或许是要消灭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遗产,可是在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上,不可思议的,它却偏偏产生了两个考古学

\*Tsuen-hsuei Tsien,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 2<sup>nd</sup>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With Afterword by Edward L. Shaughnessy. 中文本《书于竹帛: 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 2004 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世纪文库》本。此序未及收入。

上极重要的发掘。一是在西安城外秦始皇帝墓旁的兵马俑,二是在长沙马王堆的三个墓,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1972年,当第一个墓即軫夫人(长沙王利苍之妻)的墓被发掘时,她的尸体保存得几乎完整无缺。次年,当第三个墓即軫夫人与利苍王之子的墓被发掘时,它益发引起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兴趣,因为它保存着一批书于竹帛的手稿,其中有最早的写本《易经》及《老子》、一部《战国纵横家书》、许多医药文件、各种占卜星相著述、地图以及殉葬物品的遣策<sup>③</sup>。在其后25年内,这些写本已成为众多学术研究的中心,再加上在此时期内所发现的数百件其他古文字资料,已完全改观了对古代中国研究的结论<sup>④</sup>。今日,正如《墨子》所说“书于竹帛”的文献以及“镂于金石”的铭文,再加上甲骨文,这些资料现在已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语言、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资料<sup>⑤</sup>。

自从钱氏于1962年出版《书于竹帛》之后,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更是广博,钱教授已在《书于竹帛》的增订本内加以综述。以下我将自1960至2000年间中国古文字的发现,按照其赖以存在的实物,即甲骨、青铜、石刻、简牍和绢帛<sup>⑥</sup>,以及因此而激发学术上的进步,作一有系统的陈述。在此期间,每一类实物都有惊人的发现,其数量之大,已使每一类资料都已形成一种专门的学科,其质量之重要也使每一学科都改变了原来的面貌<sup>⑦</sup>。为了要表示这些学科的发展,我将在注释中对近40年来所产生的重要工具书加以系统的介绍,但对每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则不多申述。钱教授在《书于竹帛》的第二版里已提及若干最重要的研究资料,我将再补充一些。尤其在西方的著作里,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我将提及它们最有价值的贡献,并加简略的介绍。

## 一、甲骨文

刻有古文字的龟甲碎片1899年时就已流传于北京。当这些古

文字被解读后,学者才了解这些龟甲上的刻文乃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记录,其刻成的年代应是商朝最后9个王朝(约公元前1200—前1045)之内。1928—1936年间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发掘所得数万片龟甲是在中国政府主持下第一次的考古工作。当钱氏从事《书于竹帛》的写作之时,甲骨文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古文字学中特别重要的一支。堪称为甲骨学之父的董作宾氏(1895—1963)在回溯甲骨文研究最早的六十年时,曾作出颇为悲观的结论: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甲骨学的黄金时期,此后的二十年都是昏沉而无生气<sup>⑧</sup>。可是董氏悲观得太早了。他的这本书在1965年出版十余年后,就有两次很重要的发现,使甲骨学兴旺到董氏从未梦想到的地步。

第一次发现是来自1973年的发掘,因地点是安阳小屯村之南,因此,这一发现也就被称为小屯南地甲骨。这次发掘获得5000余片龟甲和牛骨,上面有7000个各自独立的刻文<sup>⑨</sup>。这些刻文中最大一部分的类型就是过去争论的断代及年代问题。因为小屯南地的甲骨片是从不同的地层中掘出,所以它们的出处引起了重新研究它们的断代以及所有商朝甲骨的断代,这些问题已成为现在研究上最重要的关键。因此,从这个问题演绎出来的研究方法也引起许多对晚商历史上的争论<sup>⑩</sup>。

安阳小屯南地甲骨发掘后三年,又有一处主要的甲骨发现,不过这次发现的情况颇不相同。1976年,一批17000片的龟甲于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的西周庙堂的废址里发现,那正是周原的中心地带——周民族祖先的故土。这次的发现中,大约有300片刻有文字,而且曾被用作火占,不过这种火占虽类似却和安阳发掘所用者不同<sup>⑪</sup>。这一发现证明了甲骨占卜绝对不是像传统记载中所说由商王所独有,而是一直被因袭应用到西周。实际上,像后来其他古文字学的例证所证明已超过了西周。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周原甲骨刻文,就我们今日所知者而论,似乎是最早而又最有系统的资料,可用来证明蓍筮的应用,而蓍筮又与《易经》相关。这项证据是数字

符号,几乎每一符号的小组都是六个数字<sup>⑫</sup>。现在大家公认这些以六位数字组成的小组就是《易经》一类筮占的早期例样。

在这些甲骨文的新发现之外,甲骨学本身也有许多重要的发展,包括许多重要的出版物问世,如《甲骨文合集》及其续篇《甲骨文合集补编》、两代甚或三代的甲骨文索引及字典、甲骨学史、论文集及专题研究,多得无从列举<sup>⑬</sup>。甲骨学最近的研究大都来自中国学者,但西方学者也作出可观的贡献。其中有两部最重要的著述应加介绍,一是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的《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期的甲骨文》(*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of Bronze Age China*);另外是司利义及高岛谦一(Paul L-M. Serrys and Ken'ichi Takashima)合作的《殷墟文字:丙编注释》(*Translations of Fascicle Three of Inscriptions from Yin Ruins*),丙编收集的是1936年安阳所发掘的甲骨文,这是一部对此书的译文和注释<sup>⑭</sup>。这三位是近三十年来对商朝历史及语言研究以西文著述的重要学者<sup>⑮</sup>,他们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说明了占卜的语句,也就是甲骨文的语句,都是陈述或祈祷,而不是问疑。在了解甲骨文及占卜中的语言及思想上,这是一项根本的突破<sup>⑯</sup>。

## 二、青铜器铭文

甲骨文之发现是十九世纪即将结束时之事,但青铜器的铭文却久已为世人所熟知。当钱教授写作《书于竹帛》之时,金文已经是中国古文字学中主要的一支。1937年罗振玉(1868—1940)的《三代吉金文存》收集了商周两代4831件各式器皿及钟的铭文拓片,反映出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然而,在《书于竹帛》出版之后,这个已经比较成熟的园地,同甲骨文一样,也有极大的发展。一是新的资源,二是新的方法。以下我就介绍金文中的这两个方面。

甲骨的发现,大体上来说,只限于几个地窖,每窖都保存有大

量的实物；但有铭文的青铜器的发现，仅在最近五十年内，已有数千处之多。不过，这些发现通常都是小规模，往往一个墓内只有一件或两件。当然，这也有特别的例外，使我们看到一些宏伟而有奢侈陈设的墓。譬如，1976年在安阳发掘的妇好墓里，就有200件青铜器皿，其中的110件有铭文<sup>⑦</sup>。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所发掘的曾侯乙墓里，有64件有铭文的钟，两件有铭文的鼎和罍，一件戈，还有许多并无铭文的青铜器皿<sup>⑧</sup>。考古学家了解，有许多青铜器都是在战乱中，为了安全及保护而被埋藏于地窟中。许多这一类的地窟已在陕西渭水流域一带发现，大都是西周王朝的贵族在西周末期（公元前771年）撤离此地时所埋藏。至少是在中国有了现代考古学以后所发掘的地窟中，最出色的一个就是1976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村所发掘微家族的墓，其中藏有103件青铜器，其中74件有铭文，包括今日闻名于世的史墙盘，其上有284字的铭文，并列出西周最初的七个王朝，从文王始，铭文称共王为当今之天子，以及微氏家族的五世，包括墙本人的历史<sup>⑨</sup>。

在讨论最近五十年发现最重要的有铭文的青铜器时，不可避免的会遗漏某些学者所认为是最重要的。我在此仅简单地介绍六件有铭文的器皿，从时间上说，是从周初到公元前第4世纪结束，作为对所有发掘出土的青铜器的代表。

利簋，1976年于陕西临潼出土，今日被认为是西周最早的青铜器。铭文记载此器是由王（大约是武王）授与一位名利的臣属；铭文开始就说这是周克商后之第八日。此铭文虽仅有32个字，但却极为有名；一因它涉及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再因它有一段极为难解，至今仍在聚讼纷纭<sup>⑩</sup>。

公盃，是一件西周中期偏晚的器皿，由北京保利博物馆在香港古玩店里购得<sup>⑪</sup>。器内有98字的铭文，读来却像是《尚书》中的某一篇。开始它就说上天命禹控制洪水，又叙述禹如何争回土地并

统治人民；然后讲到上天生浴于德之“我王”，论政治中德之高度重要，最后又说这器皿制作者的警言：“民唯克用兹德，亡悔。”这篇铭文刚问世未久，尚未为人所周知；但将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学及哲学的起源时，它定然有其重要的地位。

猷簋，1978年在陕西省扶风县齐村发现，发现地点距离唐代有名的法门寺仅一公里。它是极罕见又确实为周厉王所铸<sup>②</sup>。周厉王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是一标准的暴君，被迫在流放中度过了最后的十四年；可是这篇在他流放前夕所作的铭文中，他却似乎是一位颇有良知的君王，关心祖先留下来的文教，也关心庶民的福祉。

晋侯蕭编钟的发现应被视为考古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1992年春季，盗墓者在山西侯马天马曲村，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晋国诸侯墓地里，打开了一座大墓。数月之后，墓中的礼器即出现于香港古玩店里。上海博物馆购得14件有铭文的编钟，上有连续300个字的铭文，但缺少最后的祝词。不久，在1993年元月，考古学者在天马曲村墓园里发掘这个已被盗掘过的墓（编号为M8），发现了盗墓者忽略了的许多青铜器，其中就有两个刻有最后祝词的小钟。因此就把上海博物馆的那一套编钟的铭文凑齐<sup>③</sup>。无疑的，这十六个钟被编组成一套的时日，这长篇铭文即刻在上面。然而，大多数早期铜器铭文都是在铸造时铸在器上，可是这一套晋侯蕭编钟的铭文却是刻在铸好的钟上。并且，从这些钟的装饰上可以看出，它们原来属于至少三套不同的组织，然后被拼在一起。这些特点就使这一发现具有特殊的意义。铭文说某一周王在他第33年的征伐中，受到晋国某侯的帮助，铭文说这个晋侯的名字是蕭，向晋侯蕭颁奖的是周王。蕭在《世本》上是晋侯的名字，谥号是晋献侯。但《史记》说他的统治是周宣王6至16年（公元前822—前812）。因此，晋献侯统治的年代与铭文所说的周王33年无法配合，可以肯定《史记》的年代有误<sup>④</sup>。

1978年，另外发现一个有铭文的钟也引起了学者们重大的注

意。在陕西省宝鸡太公庙发掘出八个编钟,五个甬钟,和三个鎛<sup>⑤</sup>。这八个钟每一个都有同样的135个字的铭文,说明它们是为秦公所铸;虽然秦公之名并未被提及,可是根据铭文中的叙述,我们知道此公是秦武公(公元前697—前678年在位),因此,这些钟就被命名为秦公钟(或鎛),或秦武公钟或鎛。这篇铭文就是这个后来并吞了东周诸国而建立了秦朝的秦国的早期史料;此外,这篇铭文又与另外两篇相同的铜器铭文极为相似:一件是为了秦国早期的国君,名叫秦公钟,它的铭文已被收集在吕大临(1046—1092)的《考古图》里;另外一个是在1923年在甘肃天水发现的秦公鎛<sup>⑥</sup>。在这两件铜器铭文里,秦君之名虽并未被提及,但是铭文中有些旁证可以推论他是秦国的哪一位国君,只是仍然不是十分清楚。这个暧昧不清之处已使得研究者设想了六个以上的人选,他们在时间上跨过了150年(公元前663—前501年)<sup>⑦</sup>。即使不问哪一个秦君是这些钟鎛的监制人,这些铭文与前此数世纪的秦武公钟(或鎛)的铭文相似之处,已使许多学者认为东周初期的西戎之秦比传统文献中所描写的保守得多;这些传统的文献也表示对东(即中原)的偏见。

中山王𨵿鼎是中山王𨵿(公元前327—前314年在位)墓中所发现一大批文物之一。这墓在河北省平山县,于1974至1978年间发掘<sup>⑧</sup>。这个鼎高51.5公分,口径65.8公分,重60公斤;它有许多特别之处。第一,此鼎之身是由青铜制造,但其三足却是由铁制成,这在大型器物上是前所未有的。其次,上面的469个字是东周青铜器上最长的铭文,刻在鼎的外层,而不像一般铸在鼎的里面。这铭文的书法是精致而修长的篆体,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工艺上的涵义,都极耐人寻味<sup>⑨</sup>。

在中国传统的记载中,中山属于白狄,是一种非华夏的野蛮民族,居于中原之北。在公元前400年时,它被认为完全缺乏中国人所称的文明及道德,可是到公元前310年前后,当此鼎及铭文制造时

(约公元前316或前315年),中山国之瞽王却表示自己已具有完美的“儒家”道德。铭文中所庆贺之人是他的老师名颺。这位老师不仅在德知方面教育瞽王,而且曾经率领中山之军战胜了燕国。瞽王一方面称赞颺之功绩,一方面也记下他们二人间职分上的关系。历史可以解释他为何重视此点。燕国王名脍(公元前320—前312年在位),公元前316年让位于他的大臣。让位被当时的诸王国,特别是中山王瞽,认为是对王权的冒犯,而王权却又是中国政治常规中的柱石。于是,王瞽在铭文中强调为王者要统,为臣者要治,然后又为此说出一篇道义上的责任。这些说明是在古文字中最初看到的几个哲学名词,像“仁”、“忠”及“道”。

正如甲骨学的发展一样,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研究并不只限于新资料的发现,在整理方面有铭文的合集——《殷周金文集成》,其中所收集的金文比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增加两倍有余<sup>⑩</sup>。另有两本摘要性的书,对金文的解释为人所重视。一本是《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其中增订了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的《图录》和《考释》,收集了许多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铭文和解释<sup>⑪</sup>;另外一本是白川静的《金文通释》,对1978年间所见到的247件最重要的金文作了最彻底的讨论<sup>⑫</sup>。不久,有两本金文索引同时出现,以供研究的需要<sup>⑬</sup>。最近数十年中,也出版了许多辞典和参考书,包括考释字源的《金文诂林》及《金文诂林补》<sup>⑭</sup>以及各种文字的索引《金文著录简目》<sup>⑮</sup>。

西方学者对金文的研究类似他们在甲骨上的贡献。当钱教授开始写作《书于竹帛》之时,一位澳洲学者巴纳(Noel Barnard)已经在研究青铜器及其铭文。多年来他特别注意伪造的问题<sup>⑯</sup>。顾立雅(Herrlee Creel)是钱教授的师友,在他讨论西周的专著里,也强调了青铜器铭文的重要<sup>⑰</sup>。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是芝加哥大学顾立雅的继承者,出版了《西周史料:青铜器铭文》(*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sup>⑱</sup>,

其中包括金文研究的历史,如何阅读金文,青铜器的断代,以及铭文在史学中的价值。东周金文的研究<sup>③</sup>颇为分散,可是也有几篇博士论文专论某国的青铜器以及钱币的铭文<sup>④</sup>。最后,铭文的研究不能与器物的研究分开,赛克勒博物院(Arthur M.Sackler Museum)曾出版一系列的目录,介绍它所收藏的商代、西周、东周各时期的青铜器,是研究及解说青铜器的最佳资料<sup>⑤</sup>。(待续)

注:

①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20世纪20—30年代在安阳所发掘的甲骨文和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关于安阳的发现,见董作宾:《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甲编》,南京,1948;台北,1953);董作宾:《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乙编》三册,南京,1948—1949;台北,1953;张秉权:《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编》三册,台北,1959—1972;关于汉简,见劳幹:《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三册,台北,1957。

②另有一部西文研究居延汉简的书是Michael Lo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汉代行政之记录), Cambridge, 1967, 二册。

③《周易》写本尚未正式出版,部分有影本发表,见傅举有编《马王堆汉墓文物》,长沙,1992;全部释文见《道家文化研究》,第3期(1993)及第6期(1995);英译见 Edward L. Shaughnessy,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Second Century B.C. Mawangdui Text* (马王堆易经写本第一个英译本), New York, 1996。《老子》在马王堆诸抄本中首先正式出版,见《马王堆帛书,壹》,北京,1980;这个写本也有几种英译本,见D.C.Lau 刘殿爵, *Chinese Classics: Tao Te Ching* (中国经典:道德经), 香港, 1982; Robert G. Henricks, *Lao-tze Te-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Dui Texts* (老子德道经:马王堆写本新译), New York, 1989。关于《战国策》,见《马王堆汉墓帛书,三》北京,1983;英译见Yumiko F. Blanford, *A textual Approach to 'Zhan-guo Zonghengjia Shu':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Proximate Original Word among Variants* (考订战国纵横家书的方法)》, *Early China*, 16 (1991): 187—207。关于《战国策》和其他古籍的讨论,见Michael Loewe,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中国古代典籍导读), Berkeley, 1993; 其中有钱教授所写之《战国策》一篇。关于医药方面, 见《马王堆汉墓帛书, 四》, 北京, 1985; Donald Harper,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 (中国古代医药文献: 马王堆医药写本), London, 1998。其他如占卜、星象、地图等方面的定本尚待出版; 英译见Robin Yates, *The Five Lost Classics: Tao, Huang-Lao, and Yin-Yang in Han China* (五种失传的经典: 汉代的道、黄老及阴阳), New York, 1997。

④关于马王堆的学术论文, 见李梅丽, 《马王堆汉墓研究目录, 1972—1992》, 长沙, 1992; Kando Hiroyuki近藤浩之, “马王堆汉墓关系论著目录”, 《中国出土史料研究》1(1997): 251—199。英文著作关于古文字在中国古史研究中之重要, 见Edward L. Shaughnessy,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 and Manuscripts* (中国古史研究的新史料: 铭文及写本的导读), Berkeley, 1997; 又见Enno Giele对此书之评论,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Including Addenda and Corregenda to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论古代中国的铭文及写本)”, *Early China*, 23—24 (1998—99): 247—337。

⑤中国古文字研究最重要的著作是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 上海, 1988; 英译见Gilbert Mattos 及Jerry Norman, *Chinese Writing*. Berkeley, 2000。

⑥在《书于竹帛》的第一版中曾提到楚帛书是1942年在长沙楚墓中所发现。在西方, 对此帛书最详细的研究是Noel Bernard, *Scientific Examination of an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 as a Prelude to Deciphermen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cal Assessment* (对于楚帛书的科学研究), Canberra, 1973。对楚帛书最重要的研究是李零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 北京, 1985。此书的英译, 见李零及Constance A. Cook, *Translation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楚帛书译文), 在Constance A. Cook and John S. Major, *Defining Chu: 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 (楚的定义: 印象与实际), Honolulu, 1999, 171—176。1992年在甘肃敦煌悬泉发现一件帛书私人信件, 时期约在公元前37—前32年; 见《中国文物精华》第111期(1997)。

⑦对各种考古资料的介绍, 见Endymion Wilkinson, *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中国史手册), Cambridge, Mass., 1998, 351—470, 746—773。

⑧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台北,1965。

⑨关于小屯南地甲骨文,见《小屯南地甲骨》,二册。北京,1980—1983。1991年在安阳花园庄发现甲骨1583片;初步报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6,488—499。

⑩最近的辩论是由一群考古学家用笔名肖南,对知名甲骨学者的批评。有趣的是这些考古学家采取了保守的观点,而甲骨学者却重新考虑对甲骨断代学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关于初期辩论的情况,见肖南,“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自组卜甲——兼论自组卜辞的时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76.4:234—241;“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3(1980):43—79;《小屯南地甲骨》,上海,1980,3—58;李学勤,“关于自组卜辞的一些问题”,《古文字研究》3(1980),32—42;“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5,27—33;裘锡圭,“论彣组卜辞的时代”,《文字学研究》:6(1981),262—320;林澧,“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9(1983),111—154。对于这些研究的评论,见Edward L. Shaughnessy,“Recent Approaches to Oracle Bone Periodization: A Review”,*Early China* 8(1982—83);根据李学勤、裘锡圭及林澧的研究,新的整理见黄天树《殷墟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台北,1991;方述鑫,《甲骨卜辞断代研究》,北京,1994。

⑪发现的初步报告见“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10:38—41。关于周原甲骨,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北京,1984;许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西安,1987;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1988;曹玮,《周原甲骨文》,北京,2002。对周原甲骨,英文著作尚少讨论,仅见Shaughnessy,“Zhouyuan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Entering the Research Stage?”,*Early China*,11—12(1985—87)。

⑫首先解读这些数字的是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4;英译见H. Huber及R. Yates等,“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inatory Inscriptions of Early Zhou Bronzes”,*Early China*,6(1980—81):95—115。又见张亚初及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祀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2;译文见Shaughnessy,“Some Observations about Milfoil Divination Based on Shang and Zhou Bronze Numerical Symbols”,*Early China* 7(1981—82)。

⑬见郭沫若及胡厚宣编《甲骨文合集》13册,北京,1978—1982;彭邦炯等辑《甲骨文合集补编》,北京,1999。甲骨文第一部通检是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东京,1967;修订本1971;较新者是姚孝遂及肖丁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三册,北京,1989。另有由饶宗颐主持以计算机编制的《甲骨文通检》五册,香港,1989—1998。关于周原甲骨文的著述有许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及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甲骨文字汇有李孝定编《甲骨文字集释》16册,台北,1965;松凡道雄及高岛谦一编《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东京,1993;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四册,北京,1996。甲骨学通论有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北京,1981;吴浩坤及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1985;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1988;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北京,1989;王宇信与杨升南编《甲骨学一百年》,北京,1999。宋镇豪《百年甲骨学论著目》,北京,1999。

⑭David N. Keightley,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of Bronze Age China*. Berkeley, 1978; Paul L—M. Serruys and Ken'ichi Takashima, *Translations of Fascicle Three of Inscriptions from the Yin Ruins*; Ken'ichi Takashima, *Commentaries of Fascicle Three of Inscriptions from the Yin Ruins: Palaeographic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上述二者可在网络(<http://www.synonyma.serica.comparata>)查到。

⑮各家的著作目录,见David Keightley, *Early China* 20(1996); Paul Serruys, *Monumenta Serica* 33(1977—1978);其传略及较完备目录,见W. South Coblin, "Paul L—M. Serruys, C.I.C.M. (1912—1999)", *Monumenta Serica* 47(1999)。

⑯对此问题的讨论,见David N. Keightley, "Shi Cheng: A New Hypothesis about the Nature of Shang Divination"; Paul L—M. Serruys,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oung Pao*, 60, nos.1—3(1974); 裘锡圭, "An Examination of Whether the Charges in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re Questions", *Early China*, 14(1989); David S. Nivison, "The 'Question' Question", *Early China*, 14(1989)。

⑰妇好墓发现的初步报告,见《考古学报》1977:2;英译见Elizabeth Childs—Johnson, "Excavation of Tomb no.5 at Yinxu, Anyang",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15:3(1983)。正式报告见《殷墟妇好墓》,北京,1980。妇好墓中青铜器照片,见方闻编*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New

York, 1980。

⑮曾侯乙墓发掘的初步报告,见《文物》1979.7;英译见*Chinese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1: 3 (1979—80), 3—45。英文著述见Robert L. Thorp, “The Sui Xian Tomb: Rethinking the Fifth Century”, *Artibus Asiae*, 43 (1981—82); 较近的研究见Alain Thate, “Une Tombe Princiere du cinquieme siecle avant notre ere (tomb no. 1 de Leigudun):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巴黎第七大学博士论文, 1985。

⑯初步报告见“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3; 英译见*Chinese Archaeological Abstracts*, Vol. 2, *Prehistoric to Western Zhou*. (1985)。研究青铜器铭文的西文著述见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Berkeley, 1981。

⑰初步报告见“陕西临潼发现武王征商簋”,《文物》1977.8; 对此铭文不同的解释,见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87—105。

⑱保利博物馆出版一本专集:《公盨: 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 北京, 2002。另有李学勤、裘锡圭、李零和朱凤翰的专文讨论,见《中国历史文物》, 2000.11—12。

⑲关于猷簋的发现,见罗西章“陕西扶风发现西周厉王猷簋”,《文物》1979.4; 英译见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171—72。猷就是周厉王,另外还有两件铜器:第一件称为宗周钟,收入18世纪的《西清古鉴》,多年来已为青铜器学者争论的中心,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它是猷与周召王而不是厉王。第二件是五祀猷钟,1981年在陕西扶风百家村发现,见穆海亭及朱捷元“新发现的西周王室重器五祀猷钟考”,《人物杂志》1983.2。因为猷簋明显是西周晚期的铜器,一般意见认为这个问题中的周王是厉王。

⑳关于M8号墓的发掘,前此被盗以及上海博物馆购藏经过,见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的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1。关于上海博物馆购得的钟,见马承源“晋侯苏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1996:1—17。英译见Jaehoon Shim “The ‘Jinhou Su Bianzhong’ Inscription”; David S. Nivison & Shaughnessy “The Jin Hou Su Bells Inscriptions and the Implications”, *Early China* 22 (1997)。

㉑这是一次座谈会的主题,见“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3; 补充意

见, Shim “The Jinhou Su Bianzhong Inscription” ; David S. Nivison & Shaughnessy, “The Jin Hou Su Bells Inscrip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hronology of Early China,” *Early China* 25 (2000)。

②⑤关于这些钟的初步发现, 见卢连成及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铸”, 《文物》1978.11。英译见 Gilbert L. Mattos, “Ea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Shaughnessy, *New Sources of Chinese History*, 111—113。

②⑥秦公钟见《考古图》7. 9; 英译铭文见 Mattos “Ea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Shaughnessy, *New Sources*, 117—119; 秦公簋英译见同上, 114—117。

②⑦问题讨论见 Mattos, 同②⑥, 119—120; 其他意见见 Mattos, “The Stone Drums of Ch’in”,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no.19 (Nattetal, 1988)。

②⑧发掘的初步报告见“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 《文物》1979.1。完整的报告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髡墓: 战国中山国王之墓》, 二册, 北京, 1995。

②⑨铭文英译及中文研究见②⑥引 Mattos, “Ea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104—111。

③⑩《殷周金文集成》, 18册, 北京, 1986—1994; 续集收1988—1994年间新发现及论文。新刊见刘雨及卢岩《新出殷周金文集录》, 北京, 2003。

③⑪马承源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4册, 北京, 1986—1990。

③⑫白川静《金文通释》, 56册, 神户, 1962—1984。

③⑬张亚初编《殷周金文集成引得》, 北京, 2002。此书是针对《殷周金文集成》所编。另外有《金文引得》二册(殷商西周卷及战国卷), 南宁, 2002; 这是用计算机编制的引得。此书将取代周何等用计算机所编之《青铜器铭文检索》,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5。因后者所收铭文8500件乃取自台湾出版的全集, 而不是根据较全的北京版《殷周金文集成》。

③⑭周法高等编《金文诂林》16册,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1975; 《金文诂林补》8册,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1。

③⑮孙雅维编《金文著录简目》, 北京, 1996; 收录1986年以前的作品。

③⑯Barnard 早期研究此问题的著作有两种: “New Approaches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Chin-Shih-Hsueh (金石学研究新方法)”,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 (1959): 1—31; 和 “Some Remark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a Western

Zhou Style Inscribed Bronze (关于一件西周式有铭文铜器的真伪)”, *Monumenta Serica* 18 (1959): 213—244。Barnard最近的著作是 *The Shan-fu Liang Ch'i Kuei and Associated Inscribed Vessels* (膳夫梁其簋及其相关铜器), 台北, SMC出版社, 1996。此书内有Barnard的著作目录43种及对铜器真伪的讨论, 见页365—382。

③⑦Herr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 1,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中国权术之起源, 第一卷, 西周帝国), Chicago, 1970。

③⑧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西周史料: 有铭文的青铜器), Berkeley, 1991。他的另一篇“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西周铜器铭文)”, 见 *New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Studies*, 57—84。研究此问题者有Lothar von Falkenhausen, “Issue in Western Zhou Studies: A Review Article (西周问题之研究)”, *Early China* 18 (1993);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s Collection* (赛克勒收藏中的西周青铜礼器) 及 *Suspended Music: Chinese Bells in the Bronze Age of China* (乐悬: 青铜时代中国的编钟), Berkeley, 1993。

③⑨对东周金文的介绍, 见②⑥引Mattos, “Ea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东周铜器铭文)”。

④⑩Darrel P. Doty,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Ch'i: An Interpretation (齐国的铜器铭文: 解说)”, 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 1982; Constance Cook, “Auspicious Metals and Southern Spirits: An Analysis of the Chu Bronze Inscriptions (吉金与南方神社: 楚铜器铭文分析)”, 加州大学博士论文, 1990。彭柯“Coinage in Classical China (中国古代的钱币)”, 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 2000; 研究战国时期的钱币及其铭文。

④⑪Robert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赛克勒收藏中的商代青铜礼器), 1987; ③⑧引Jessica Rawson文; Jenny So,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赛克勒收藏中的东周青铜礼器), 1995。

作者工作单位: 夏含夷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